

July 2024

Fictional Narrative as an “Ethical Laboratory”: A Study of Paul Ricoeur's Narrative Ethics

Wenting Xiao
zzuxwt@163.com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Xiao, Wenting. 2024. "Fictional Narrative as an “Ethical Laboratory”: A Study of Paul Ricoeur's Narrative Eth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2/2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作为“伦理实验室”的虚构叙事

——保罗·利科叙事伦理学研究

肖文婷

摘要:从韦恩·布斯的奠定基调到詹姆斯·费伦的扎实推进,叙事伦理学从20世纪90年代起应运而生,逐渐发展为包容多项批评方式的研究进路。相较于布斯对作者意图的强调、费伦对读者阅读伦理的重视,保罗·利科极富创见地将作者、读者置于虚构叙事建构的“伦理实验室”中,把对单一伦理主体的重视转移到对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伦理意义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在他看来,虚构叙事不仅是作者将其“思想”图式化,展开伦理探询的实验场所,也是读者“占有”伦理实验,练习实践智慧,从而达成“从文本到行动”的转化力量的实践基地。这一看法创造性地将虚构叙事视为作者与读者伦理实践的实验场所,为叙事学的伦理分析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伦理实验室; 善的生活; 不协调的协调性; 实践智慧

作者简介:肖文婷,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理论及叙事学研究。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科学大道100号郑州大学文学院,450001。电子邮箱:zzuxwt@163.com。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开放40年文学理论学术史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19ZDA26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ictional Narrative as an “Ethical Laboratory”: A Study of Paul Ricoeur’s Narrative Ethics

Abstract: Since its inception with Wayne C. Boo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ames Phelan, narrative ethics has evolved since its emergence in the 1990s into a research framework encompassing diverse critical methodologies. In contrast to Booth’s emphasis on the author’s intention and Phelan’s focus on the reader’s reading ethics, Paul Ricoeur develops a creative view of placing the author and the reader in an “ethical laboratory” constructed by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shifting the focus from a single ethical subject to the dynamic process of generating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author, the text and the reader. In addition to considering fictional narrative as an experimental site for schematizing the author’s “thought” and implementing ethical inquiry, he also thinks that fictional narrative is a practical basis for readers to achieve the power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ext to action” by “appropriating” ethical experiments and practicing practical wisdom. Therefore, the creativity of this view is to consider fictional narrative as the experimental site for the ethical practice of authors and readers, thus offering a new research idea for the ethical analysis of narratology.

Keywords: ethical laboratory; good life; discordant concordance; practical wisdom

Author: Xiao Wenting, Ph. D.,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narratology. Address: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100 Science Avenue, Zhengzhou 450001, Henan, China. E-mail: zzuxwt@163.com.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19ZDA262).

虚构叙事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是保罗·利科晚年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其叙事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利科看来,虚构叙事在伦理层面上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作者完全可以借助虚构

叙事的筹划能力将自己的伦理“思想”图式化,展开各式各样的伦理探询,从而把虚构叙事转化成一种“伦理实验室”;而读者也可以借助对这一“实验成果”的“占有”,把在虚构叙事中历练出来

的实践智慧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来,从而实现“从文本到行动”的转化和跨越。

一、何为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

利科是在1983年出版的《时间与叙事》(卷一)一书中首次提到“伦理实验室”(ethical laboratory)相关概念的。他宣称,艺术最古老的功能之一在于“它构成了一个伦理实验室,在这里艺术家借助虚构叙事的模式展开针对价值的实验”(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I* 59)。①总的来说,所谓“伦理实验室”指的是以走向“善的生活”为理想,以虚构情节模拟伦理境遇,从而达成伦理探询目的的文本实验场所。

对于利科而言,虚构叙事所具有的源初伦理属性正是“伦理实验室”的立题之基。他强调,虚构叙事不可能保持伦理中立,它不可能“为了纯粹美学的规定而失去伦理规定”,因为虚构叙事中“没有一种行动不引起赞赏或谴责,无论这种赞扬或谴责的程度有多小,都体现出以善和恶为极点的价值等级层次”(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 94)。受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行动及人物的伦理预设^②影响,利科认为虚构叙事必然描写行动,而行动必然会由于伦理偏好尺度的不同而被判断、被评估,它们一定会被赞同或不被赞同,也一定会被比较是否比另一个行动更具价值;而延伸到施动者本身,他们也势必涉及好坏、善恶的评价,一定会被赞扬或被谴责。这些对行动及施动者伦理价值的判断与评价,自然预设了虚构叙事的伦理本性,因此利科明言它永远不会终止对伦理学的借用,走向纯粹美学所宣扬的伦理中立。

在确定了虚构叙事的伦理前提之后,利科把“善的生活”视作伦理实验的基本主题。在他看来,所有的虚构伦理实验都是在这一主题之下的想象力的变更。溯源来看,“善的生活”这一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后经由麦金太尔抵达利科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主张“善的生活”有三个特点:其一,“所有事情都以善(good)^③为目的”。(Aristotle 3)尽管每种实践总有自身的目的,但“善”是所有实践的终极目的,它意味着“生活得好或做得好”,这里的“生活得好”被麦金太尔化用为“善的生活”(good life),并引为“真正人生的目标”。其二,要想达到“善的生活”就需要借助

实践智慧,它意味着,一旦个人提出了一个目的,他就需要检查以什么手段来实现它,审慎地选择最恰当的手段,由此“审慎”成为众多学者认证的“实践智慧”的代名词。^④其三,作为检验“善的生活”之标准的“幸福需要完全的美德和一生的时间”(Aristotle 16)。这意味着幸福不能依赖个别事件,个人的一生必须被聚集起来,以充当“善的生活”这一目标的支点。麦金太尔将其吸收为自己提出的“生活的叙事统一性”概念,主张以叙事形式来聚集个人生活。在他看来,我们讲述一个人趋近“善”的一生,就必须借助叙事,唯有叙事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能够为这一目的及其达成的手段提供支撑(麦金太尔 277)。利科对此十分赞同,他指出:“如果[‘善的生活’]这一目标想要成为图景,就不得不在叙事中被描绘出来,借助这些叙事,我们通过‘操弄’(在该术语的强意义上)各种相反的可能性而尝试不同的行动进程。”(Ricoeur, *Soi-même* 195)在利科看来,叙事活动能够把道德判断的目标“图式化”,而虚构叙事则能够借助于自身的筹划能力提供各种可能的手段,因为作者能够借助想象力对情节进行自由的编排和操纵,以虚构情节模拟主人公及人物的境遇,不停地探索评价行动与人物的新方式,以及不同手段带来的伦理价值,以此来测试和实验达成“善的生活”这一伦理目标的可靠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虚构叙事成了作者进行伦理探询的实验场所。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伦理实验本身并不陌生,比如某些恋爱中的女子会让自己的闺蜜出面勾引男友,以便检验他对自己的感情是否坚贞。但在利科看来,对于伦理实验来说,虚构叙事有着多方面的优势。首先,文学叙事凭借其虚构特征可以避免任何由作品本身带来的道德责难和非议。利科认为:“虚构叙事被认为是思想实验,这个实验室的状态要求我们避免任何针对情节和人物的创造而进行道德审查的可能性。创造需要自由的想象”(Ricoeur, “De la métaphysique à la morale” 475)。正因为虚构叙事基于自由且不设限的想象力,所以它只是一种“实验室”而非现实中真正发生的事实,因而它可以避免任何针对情节及人物创造上的道德责难。我们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在道德上的缺陷归咎于作者本人,就像不能根据《洛丽塔》在描述方面的“非道德”来责难其作者纳博科夫的人品一样。而对于现实中的伦理实验

而言,哪怕它是由设计者“建构”的,它仍然是真实发生的,具有现实的操作者与被实验者,因此实验一经发出,某一方就必须承担后果。以上文中的男女为例,如果男子未能经受住考验,就必须承担出轨的后果;如果实验被男子识破,女子就必须承担欺骗男子、不信任男子的指责。

其次,相对于现实中的伦理实验,虚构叙事的可操作空间更大,所受到的束缚更少。现实中的伦理实验多受限于可操作性,它要求所选情境必须能够被现实还原出来。但是虚构叙事却可以凭借生产性想象力,创造异想天开的伦理环境。比如科幻小说可以设想一个复制的大脑代替原本的个人生存下来,以探索接踵而来的伦理问题,这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虚构叙事中的想象力并非完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它必须以行动的合理性、情节的可信性为前提与标准,由此才能保证实验的逼真性,正是这种逼真性为读者从文本走向行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最后,虚构叙事能够保障伦理实验的合理性、完整性和充分性,从而使其实验结果更加真实可靠。一方面,从操作维度而言,在一般的伦理实验中,设计者总是将自己置于道德评判者的制高点,实验设计的初衷本就充满了对实验对象的不信任,女子不相信男生拥有拒绝诱惑、保持专一的能力,老板不信任员工能够做出不中饱私囊的行为,因此他们站在不信任的基础上来企图获取信任,以窥视的形式来探测人心,以不道德的方式来探问道德,在手段方面本就背离了“善”的初衷。另一方面,从时间维度而言,现实伦理实验探讨更多的是实验对象对某种道德规范、公序良俗的遵守程度,他们测试男子是否专一、员工是否中饱私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片段化、单项化的伦理实验,与需要“完全的美德和一生的时间”的“善的生活”相去甚远。而虚构叙事建构的“伦理实验室”一方面从操作方面避免了以不道德的方式来执行实验,另一方面可以跨越主人公及人物的一生来探询“善的生活”的实现方式,因此区别于片段化的现实伦理实验,更加持久且深入。

二、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的运行机制

利科之所以将虚构叙事视为“伦理实验室”,其目的是强调虚构叙事的“实验”特性。在他看

来,伦理实验首先是针对“思想”的实验。利科认同安娜·亨利的主张,认为作品本身有一个先于它的“理论和文化支架”(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 196),因此同科学实验一样,首要的问题在于根据实验主题来设计和建构实验。利科强调:“虚构叙事作为无数思想实验的实验室,没有地方能够比它能够更好地验证思想。”(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388)对于不同的文学作品而言,作者展开伦理探询的“思想”也不尽相同,但利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乃是作者对“善的生活”的看法。对于《包法利夫人》而言,作者意欲探索的无非是追求浪漫生活、理想爱情的爱玛能否过上她眼中的“善的生活”——贵族生活,而对于《安娜·卡列尼娜》而言,作者探索的则是已经拥有贵族生活的安娜如何挣脱贵族习气带给她的牢笼,大胆追求她想要的“善的生活”——自由活泼的生活。在这里,“善的生活”的内涵多式多样甚至相斥,但在利科看来无论实验的“思想”何如,它们都是在“善的生活”这一终极目的主导下的各式变更,用他的话说,“文学虚构可以被认为是在善的生活主题下的想象力的变更^⑤”(Ricoeur, “De la métaphysique à la morale.” 475)。简言之,虚构叙事的所有想象力变更都是为了探索主人公及其他人物如何过好自己的一生,“善的生活”乃是故事中所有人物生活实践的最终目的,也是作者进行伦理实验所要探索的终极意义。

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的运行机制便在于为作者构想的各式“善的生活”思想提供图式,进而言之,文学叙事正是凭借其图式化手段来达成对伦理价值的探询实验,基于此,利科将其视为“叙述功能的图式化”。“图式”概念显然取自康德。康德曾经说过:“想象力为一个概念取得它的形象的某种普遍的处理方式的表象,我把它叫作这个概念的图型[图式][……]而把知性对这些图型的处理方式称之为纯粹知性的图型法[图式化]。”(140)在这里,概念隶属于知性范围,形象属于直观范围,要想把两者联结起来,就需要借助由想象力生产出来的图式。利科在康德的基础上,将虚构叙事中“善的生活”主题下的各式“思想”归属于知性,将虚构叙事能够提供的“图景”归属于直观。在他看来,“生产性想象力从根本上具有综合功能。它通过同时产生智性的和直觉性的综合来连接知性和直观。同样,情节编排在

故事的观点、主题或曰‘思想’与导致结局的环境、人物、插曲和命运变化的直观呈现之间,也产生了一种混合的可理解性。这样,我们可以说是叙述功能的图式化”(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 106)。因此可以说,趋向“善的生活”的“思想”仅仅完成了伦理实验的设计部分,而环境、人物、插曲等构成了实验的直观化、具象化的图景,只有两者的联合才能真正达成对伦理实验的探询。

那么具体而言,虚构叙事是如何实现对作者“思想”的图式化的呢?又或者说,虚构世界是如何达成对环境、人物、插曲等因素的统筹的呢?利科认为这主要基于“情节编排”(emplotment)。⑥他指出:“一个故事必定不仅仅是一种在序列顺序中对事件的列举,它必须把它们组合到一个可理解的整体中,即一种我们总是能够质询这个故事的‘主题’是什么的类型。”(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 102)利科认为,情节编排是一个结构化的操作过程,他将其定义为“异质元素的综合”,并赋予它“不协调的协调性”的特征。一方面,情节能够将各式各样的异质因素组合在一起,这些异质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意外的情况、发现、行动者与受动者,意料之外的机会或意料之中的遭遇,参与者之间从冲突到协作的互动,根据目的的优劣调整手段以及最终意外的结果”(Ricoeur, “Life in Quest of Narrative” 21)。正是这些由环境、人物、插曲和命运变化组成的异质变量构成了情节编排的“不协调性”,又或者,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物在趋向“善的生活”过程中的曲折变量,也成就了伦理“实验”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情节编排能够将杂乱的个别事件、异质因素、不统一的时间转化为一个完整的、从起始到结局的、“协调的”故事,从实验角度而言,它能够为伦理实验践行的各种相反的可能性以及不同的行动进程构想因果联系,将它们“把握在一起”(prendre ensemble)以证明行动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利科认为,“不协调”构成了伦理实验的最大张力,也构成了推动实验的最大动力。虚构实验室中常见的“不协调”在于作者特意设置的极端伦理境遇、“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以及针对行动可能性的各种“想象力的变更”,正是这些“不协调”将虚构叙事的伦理实验特性发挥到极致,也实现了最大限度上的伦理探询。首先,虚构叙事的“实验性”常常体现在对极端伦理境遇的构想

与设置。同现实伦理实验一样,虚构叙事也会将主人公置于精心设置的伦理境遇之中,而与一般的伦理实验又不一样,虚构叙事设置的伦理实验更具异想且极端。以托马斯·曼的《魔山》为例,作者让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小说伊始就前往高山疗养院看望表兄约阿希姆,在这个疗养院中,所有病人都被置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时间概念趋于消解。正是借助于这个极端化的情境,作者得以探索主人公作为一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人会如何面对生存与死亡、积极与消极之间的矛盾。在主人公未能抵抗住“魔山”的魔力而变得消沉倦怠之际,作者让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晴天霹雳”炸掉了“魔山”,也唤醒了主人公,让他摆脱了“山上”的肉欲与死亡氛围,穿上戎装投入“山下”的战争,由此彰显出这一伦理质询所得出的结论:“一个人为了善良与爱情,决不能让死亡主宰自己的思想。”(曼 533)利科认为,正是这种极端化的伦理情境锻炼出了主人公的伦理智慧。用他的话说:“叙述者自由设置了一个极端处境,他让主人公甫一出场就面临时间被遗忘的境况。这场考验迫使他的学习过程构成一个思想实验,它不仅被动地反映了时间失重的状态,还探索了由此暴露出来的极限处境下的悖论。”(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 192-193)

其次,虚构叙事的实验性还体现在,作者常常设置“意料之外”的偶然事件,以此来控制伦理变量,达到伦理探询的目的。以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例,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努力工作以支撑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此时的他受到全家人的尊敬,父母夸奖他,妹妹爱戴他。但是,造成家人对其尊敬的原因到底是萨姆沙本人,还是他附带的物质贡献?针对这一富含多重变量的问题,作者展开了“伦理实验”,他首先保证了萨姆沙本人的意识与性格不变,但却通过将其变为甲虫这一超现实的意外情节消解了他的工作能力和物质贡献,结果在这一变量的作用之下,全家人都逐渐抛弃了对他的尊敬和爱戴,无不将其视为累赘,甚至他最爱的妹妹都提议将其赶出家门。正是通过这一“伦理实验”,作者揭示出对物质生活的过分看重而导致的道德缺失。

最后,虚构叙事的实验性还体现在它的“游戏性”。利科认为:“人类尝试理解和掌握实践领域的‘多样性’的首要方法就是给予这种多样性

一种虚构的表象。”(Ricoeur, *Du texte* 222)换言之,作为“伦理实验室”的虚构叙事凭借其试探的行动多样性而具备对现实的启发力量:创造性想象力使情节编排成为“与各种可能性的自由游戏”(Ricoeur, *Du texte* 220)。它可以与各种相反的可能性周旋而尝试各种不同的行动进程,以测试什么样的行动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效果,或者什么样的德行能够达成什么样的“善的生活”,这样的探询的确能够为人类认知自身及所处的实践领域提供帮助。以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为例,作品描写的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青年男子查尔斯抛弃自己的未婚妻,爱上了被人抛弃的女子萨拉的故事。作者为这个故事设置了三种结局:第一种结局是,查尔斯放弃与萨拉的会面,转而与未婚妻结合,他们相亲相爱并育有七子;第二种结局是,查尔斯解除婚约后向萨拉求婚,但她拒绝后不辞而别,两年后两人重归于好;第三种结局是,萨拉拒绝了查尔斯的求婚,选择了一种独立女性的生活方式。显然,这三种结局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同时也伴随着三种不同的伦理选择。作者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选择其中一种结局,而是把三种结局并置在一起,显然采取了一种后现代叙事的游戏方式。这种叙事游戏看似没有提供明确的伦理态度,实际上却极大地拓展了伦理选择的多元性。

当然,随着伦理“实验”被想象力推向极致,它同时也面对着爆裂或者说脱离因果束缚的危险。针对这种可能性,利科并不担忧,在他看来,虚构叙事构成的伦理实验并非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它仍然需要顺从叙事自身的“协调性”,用他的话说,“协调性高于不协调性”(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 55)。利科受亚里士多德《诗学》影响,认为“协调性”包含普遍性与整一性两种含义:根据亚氏,“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亚里士多德 81)。它意味着,哪怕虚构叙事的伦理实验达到了异想天开的程度,它仍然遵从事件承继的可然性或必然性原则,必须符合一般人眼中事件的发生规律。因此,怀揣着趋向“善的生活”理想的主人公不可能作奸犯科,自毁前程,他一定是依据自己期待的“善的生活”而审慎地选择最恰当的手段来达成目的的,这些手段的选择所依据的正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趋向“善的

生活”的“实践智慧”;而整一性意味着虚构叙事必须是一个可理解的整体,它依赖作者的“叙事理解”(la compréhension narrative)来将文本的情节统筹起来:他们不仅在单一事件中构想因果关系,将事件序列“把握在一起”形成一个有始有终的可理解的故事,还将环境、人物、插曲、命运变化等各种各样的异质因素集中到一个整体之中。由此,正是借助于“协调性高于不协调性”的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得以在最大限度的“游戏”之后仍保持整一的“思想”体系,又或者从文本内部的角度来说,虚构叙事能够在琐碎事件、偶然机会、命运突转等异质因素之余,将带有普遍性的伦理本质展示出来。利科强调,虚构叙事“并不关注普遍性,但它使得普遍的东西涌现出来”(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 70)。区别于和盘托出普遍性的伦理哲学,虚构叙事无意说教,而是将普遍性溶解于偶然且个别的事件中,期待读者在千头万绪的行为进程中探索导致主人公走向“善的生活”的决定性行为,而在故事的最终,伦理的普遍性才会涌现出来。

由此,正是将“不协调的”伦理实验内在于故事的“协调性”之中,虚构叙事实现了对伦理探询的图式化支撑。

三、读者与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

根据利科,虚构叙事构建的“伦理实验室”并非作者的独属空间,它一经问世就邀请着读者去“跟随”实验,“占有”实验,而读者在借助于伦理实验进行伦理探询期间也养成了属于自己的实践智慧,以便指导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最终实现虚构叙事的“揭示”和“转化”力量。

上文中谈到的“伦理实验从来不是中立的”是从叙事创作的角度而言的:作者依据自身“思想”来设计实验,以情节编排图式化自己解读的“善的生活”目标,从而展示自己想象的世界图景。在利科看来,从阅读角度来说同样如此:“阅读理论提醒我们,叙述者采取的说服策略是为了给读者灌输一种世界图景,这种图景从来都不是伦理中立的,而是或含蓄或明确地引发读者对世界和自身的新评价。”(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359)根据修辞学的看法,作者相信自己的“思想”并致力于将其图式化,并且把这份信念传达给读

者,正是这种信念力量支撑着叙述者的说服策略,它劝说着读者相信只要他们也如故事中那样行事,就能收获同样的“善的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修辞学的代表韦恩·布斯认为作者负有为读者挑选好的、正确的思想的责任和义务。^⑦利科一方面承认作者的思想在其建构的伦理实验中的支柱作用,认为伦理实验必然有伦理倾向,不存在伦理中立的虚构叙事;另一方面他又否定修辞学的作者中心论倾向,认为这种理论倾向于将读者视为“隐含作者所制定策略的猎物和被动者”(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243)。仅仅考虑了以作者“思想”为中心的、只认可作者主动性的伦理实验,在面对现代小说中日益不可靠的叙述者时,不免显得捉襟见肘。

利科主张伦理实验应该兼顾作者的主动性与读者的主动性。在他看来,“以读者为目标的说服策略确实是从作者那里开始的。对于这种说服策略,读者的回应是跟随文本的塑形和对文本所筹划的世界的占有”(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231)。这段话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利科着重强调读者对文本情节编排或曰伦理实验的“跟随”。在他看来,理解故事就是怀揣着对作品整一性的期待,跟随着作者设计的伦理实验,了解作者是如何将情节的异质元素统筹在叙事作品之中的,又或者从文本世界的角度理解主人公的行为是如何导致最终幸福或不幸的结果的。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叙事给予了读者“跟随”伦理实验的机会与权力,他们无须真正走过主人公的一生,却可以凭借阅读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跟随并体验着主人公的命运,正是凭借虚构叙事他们才能在甚至主人公都看不清的命运中看清扣动主人公命运机杼的关键行为,并见证这些行为如何拨动了主人公命运的齿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科强调:“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我们在其中试验关于赞同与谴责的各种期望、评估和判断,叙事就通过它们充当了伦理的预备教育。”(Ricoeur, *Soi-même* 139)

当然,利科的野心并非局限于接受美学所主张的参与性阅读,他进一步强调读者对作者原创的“伦理实验”的“占有”或曰“占为己有”(appropriate)。^⑧利科认为,“伦理实验”是作者“思想”主导下的原创性情节编排,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对文本世界的“占有”。在他看来,“没有伴

随它的读者,文本中就没有塑形行为;没有读者占有它,在文本之前就没有世界展开”(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239)。因此,阅读并非仅仅作作为一种外在且偶然的事件发生在文本之上,而是参与到“文本世界”的筹划与展开之中。“文本世界”是利科的原创概念,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一方面仅仅停留在想象之中,只在文本中存在且仅仅借由文本而存在;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内在的超越性”(transcendance dans l'immanence),它筹划了一个自身以外的世界,“有了这种超越性,与读者世界进行对照才成为可能”(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 15)。这个世界只有在读者接受文本之后,或者说在读者的鲜活经验与虚构经验交叉之后才能真正呈现出来。利科指出:“我们可以栖居在这个世界中并展现我们自己的最大潜力”(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149)。这意味着读者可以将文本筹划的世界占为己有,在虚构的世界中体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世存在”,同主人公一道与周遭的事物产生联系,施展自己以往全然不能实现的可能性的最大限度。而与此同时,读者也在对“伦理实验室”的占有过程中跟随着主人公的脚步,以假想的形式练习着道德判断,学习着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人生体验。利科强调:“在虚构的不现实的范围内,我们不停地探索各种新的评价行动与人物的方式。我们在巨大的想象实验室中进行的思想实验,也是在善与恶的王国中所进行的探索。改变价值,甚至贬值,这还是评价。道德判断没有被取消,它只是顺从于虚构自身的种种想象的变更。”(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242)由此,读者在跟随情节的过程之中,也“占有”着自己从未经历过的道德境遇,他们超越自身生存场景的有限视域,积极伴随着主人公在独特伦理境遇下的道德选择,估量着人物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成他们眼中的“善的生活”,共情并理解着人物在特定境遇下的不那么体面或正当的选择。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在既定的伦理评价体系内,我们自然会将安娜视为婚姻的不忠者、家庭的背叛者,但是如果我们跟随主人公的脚步,就会感受到作者“伦理实验”的初衷(他打算将这个失足的贵族女人写得可怜而无罪),他首先将女主人公放在离婚不被允许、婚姻思想尚被禁锢的封建社会尾声这一背景之中,又将活泼且充满生气的女主人公置于死

气沉沉的家庭之中,随即又安排了注意到并珍视她身上洋溢的生命力的情人渥伦斯基,这样的境遇安排自然让一直与主人公命运共进退的读者没有武断地将其视为放荡女子,反而理解她在艰难处境下背叛家庭的不体面选择,从而与作者一道同意她“可怜而无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科强调:“叙述的实践在于一种思想实验,通过这种思想实验,我们试图栖居于对我们来说陌生的世界”(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358)。正是借助于伦理实验,读者超越了自身伦理处境而达成了有限经验的倍增。

与此同时,读者也可以提前接触自己命运中未知但必将到来的行动体验。对于读者自己而言,其人生的开端与结局的体验都无法确切获知,而虚构叙事却能够以变形的方式展现人生的开端、结点乃至结局,在帮助我们探询人生即将到来的未知体验的同时,让我们熟悉并珍视接下来的人生旅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虚构叙事帮助读者达成了对伦理探询的预期。

那么阅读之后,或者说在读者“占有”伦理实验之后,虚构叙事引发的伦理实验怎样有助于读者日后在实际生活中的行动呢?利科认为这有赖于“从文本到行动”的“揭示”(révéler)和“转化”(transformer)力量,他指出:“虚构叙事的影响,揭示和转化的影响,实质上是阅读的影响。正是借助于阅读,文学才回归到生活,即存在的实践和情感领域。”(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149)在利科眼中,“揭示”意味着将那些隐藏在读者经验之中的特性暴露出来,而“转化”意味着让读者借由叙事来审视自己的生活从而改变自己的实际行动与道德品行,或者用利科的话来说,借由“文化作品中人文符号的漫长迂回”(Ricoeur, *Hermeneutics* 105)而理解自己。具体而言,读者借由对虚构叙事“伦理实验”的“占有”,在思考主人公在特殊伦理境遇下如何选择最恰当的手段,才能达成“善的生活”的同时,也锻炼着自身的实践智慧,这种实践智慧并非作者置于叙事中的原原本本实践智慧,也非主人公或人物在虚拟世界中行动得出的实践智慧,而是读者结合自身境遇和文本世界而养成的实践智慧。利科以悲剧为例强调:“因为拒绝给虚构作品呈现的是不可解决的冲突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悲剧在使人迷失了方向之后,迫使践行者在最好地回应了悲剧智慧的实践智慧

的指引下,在自己的境遇中,重新确立行动的方向,权衡它的危险和代价。”(Ricoeur, *Soi-même* 288)因此,虚构叙事不负责道德说教,也不致力于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它只是借由读者对虚构“伦理实验室”的“占有”而养成属于读者自己的实践智慧,这种实践智慧能够帮助读者在今后的生活中权衡利弊,确立行动方向,改变人生轨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科强调“以这种方式审视的生命是一个改变了的生命,毋宁说是另一个生命”(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229)。由此,利科总结道:“文学达到其最高效力的时刻,也许就是它将读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读者自己必须找到适应自己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问题构成了作品所提出的美学和道德问题。”(Ricoeur, *Temps et récit III* 254)

当然,读者对虚构叙事伦理实验的“应用”并非总是能够达到利科期待的理想状态,面对现行的道德规范以及千差万别的实际伦理境遇,读者在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中历练的实践智慧未必能够转化为他在现实境遇中的伦理选择,这也成为利科晚年着力思考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另文加以论述。

结 语

利科从叙事到伦理的自然过渡,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的跨越。以热奈特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主要建立在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因此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文本内部的叙事方式和形式结构方面。利科在从事叙事研究之初,就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这一倾向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与其保持着明确的距离。事实上,叙事问题之所以引起利科的关注,是因为在他看来,虚构叙事可以为解决自我、时间和伦理等问题带来新的视角。因此,利科的叙事学研究天然就具有跨学科、跨文化的性质。利科早年宗奉现象学和解释学,但他的志趣并不在于建立完备的哲学体系,而是在于欲望与恶等具体的实践问题。因此,他并未沉迷于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之思,而是进一步发挥了伽达默尔关于“解释学是一种实践哲学”的主张,着力于阐发一种意志现象学和无意识的解释学。尽管他在赴美之后深度浸染于英美的语言哲学传统,对于文

本和叙事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并未由此转向英美新批评所倡导的内部研究或“作品中心论”,而是致力于探究如何才能实现“从文本到行动”的跨越。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思想旨趣,使得利科的叙事学与伦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说韦恩·布斯等人还只是把道德看作现代小说的“非人格化叙述”所引发的一种伦理难题,那么利科则是反过来把叙事当成了解决伦理难题的可能路径。尽管这种做法难免有某种功利主义之嫌,但对于凸显叙事的伦理维度却似乎不无益处。

在利科看来,叙事文本的原初伦理属性不言而喻。但是虚构叙事真的就如利科所说,保持必然的伦理非中立属性吗?或者说,利科本人是否夸大了叙事与伦理的联系?也许存在着非伦理或曰伦理中立的虚构叙事。利科拿来作为假想敌的唯美主义学派就强烈主张非伦理的虚构叙事,他们完全否定虚构叙事与伦理道德的任何联系,主张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和无功利性,取消所有实际的道德判断,但该论断被利科轻易扣上了“对美学本身的误解”这一批评,在他看来,哪怕唯美主义悬置了所有实际的道德判断,切断了与当下意识形态的任何关联,读者依然能在虚构的不现实境遇中以假想的形式练习属于自己的道德判断。以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王尔德的作品《道林·格雷的画像》为例,哪怕作者在作品中并未表明其伦理态度,但这并不妨碍读者在其中“占有”道林的一生,与主人公一道体验一味追求享乐而酿成的苦果。不过,对唯美主义持相反意见的利科却走上了矫枉过正的另一面,在他看来,虚构叙事的应有之义完全在于它是“伦理实验室”,这一实验室的质询目标完全在于探索主人公及人物能否过上“善的生活”,因此虚构叙事情节的所有设计、语言的所有雕琢都笼罩在伦理价值讨论的穹顶之下,伦理道德在虚构叙事中的重要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那么,诗学真的如利科所说,“永远不会中止对伦理学的借用”吗?伦理真的达到了对于叙事而言如影随形的程度吗?我们认为,利科在此显示出了他作为一名解释学家的局限性,他笃信,虚构叙事哪怕伪装得再无功利,都逃脱不了自身的伦理预设和对读者“应用”的期待,包括虚构叙事在内的“人文符号”的终极目的都在于为人类提供认识自身、理解自身的迂回中介。由此,解释学家利科从来没有试图站在无功利的

美学创作角度来考虑虚构叙事,也无暇站在康德提出的审美活动无利害的角度来欣赏诗学,他将伦理视为虚构叙事场域中理所当然的“定海神针”,从未考虑过不借用伦理学的诗学创作。我们认为,虚构叙事的确离不开对伦理学的借用,但虚构叙事并未到达完全依赖伦理的程度,虚构叙事拥有独立生命和自身价值,它从未放弃对自身形式美的设计与雕琢,也从未忽视对自身风格美的探索,因此如果将虚构叙事完全视为“伦理实验室”,主张情节编排的终极目的就是达成“善的生活”,那么无异于走入了另一种极端,忽视了虚构叙事文本自身的形式美。

除此之外,利科论点的另一有限性在于他对真实读者的理想化设想。我们认为利科对读者的设想与要求更加类似于安贝托·艾柯提出的“经验读者”,并且相应地符合后者所批评的有限性。艾柯将叙事性文本比喻为“丛林”后指出:“我们完全可能用自己在林中行走时的每一种经验和每一个发现来理解自己的生活,理解过去和将来。但林子是为所有人而建的,我们不能在里面只自顾自地寻找自己的事迹和感受……这并不是在诠释一个文本,而是在使用它……它容易导致我们把叙事的丛林圈成自家的小花园。”(11—12)艾柯认为这种“六经注我”式的诠释方式无异于削足适履,真实读者一味地将文本中的经验与自己的人生体验适配,拿文本作为容器来贮藏自己来自文本以外的情感,将自己的期待强加于文本之上,势必“引发白日梦”,产生误解。化为利科的语境而言,利科指望有血有肉的读者能够借由虚构叙事建构的“伦理实验室”来练习道德判断,在“自家的小花园”中习得实践智慧,这一设想相对于传统的伦理教化论来说的确发现了读者的主动性,但是这一主动性在另一方面又增强了读者诠释的任意性。在利科眼中,读者不拘于自身的理解能力,他们总能在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中求仁得仁,获得属于自己的实践智慧,从而廓清行动方向,改变人生轨迹。但是,这一论点本身是否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理想化倾向?对于那些不具备道德判断能力、自身理解能力有限的读者,利科的论点难免会有捉襟见肘的一面,属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利科难以想象这类读者的存在,更遑论探索他们对文本的“占有”与“应用”行为。事实上,这样的读者并不能借由叙事文本的伦理实验获得改

变行动方向的正面效应,他们只会耽于艾柯所言的“白日梦”,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甚至走入歧途。这明显与利科期待的读者借由虚构叙事而获得实践智慧的论点背道而驰。

总的来说,尽管利科关于虚构叙事“伦理实验室”的观点颇有限性,但瑕不掩瑜,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探索叙事伦理的有效进路。

注释[Notes]

① 该书的英译本采用意译方式较为准确地地点明了“伦理实验室”这一概念,而法文原著论述较为烦琐,本文特别采用了英译本的表达方法。

②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摹仿前提正是体现幸福与不幸的行动;而诗学预设的不仅仅是施动者,而是具有高尚或卑贱道德品质的人物(亚里士多德 64、38)。

③ 根据汪子嵩等著的《希腊哲学史(第三卷)》,希腊人认为任何好的东西都是“agathon”,与英文“good”对应,既有“好”,又有道德上“善”的含义,但中文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许多学者鉴于讨论的是伦理学而将其译为“善”(汪子嵩 911),我们认为利科在此更加倾向“善”这一道德含义,因此统一将“agathon(good)”译为“善”,将“good life”译为“善的生活”。

④ 如法国学者皮耶·欧班克(Pierre Aubenque)在《亚里士多德论审慎》(*La Prudence chez Aristote*)中直接将“实践智慧”译为“审慎”(prudence)。

⑤ “想象力的变更”取自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理论,胡塞尔认为对某个事实之物(如红纸)的感知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或曰“前像”(Vorbild),而想象力可以创造出任意多的与“前像”相关的“后像”(Nachbild)或曰“变项”(Variant),如红色椅子、红色杯子等,而在这些变项之中的“常项”便意味着本质的红、普遍的红(倪梁康 483)。利科将“想象力的变更”应用到虚构叙事构成的“伦理实验”之中,在他看来,想象力可以针对“善的生活”这一“常项”做出无以计数的“变项”。

⑥ 源自亚里士多德《诗学》,希腊语为“muthos”。

⑦ “作者对非人格化、不确定的技巧选择有着一个道德尺度”;“一位作者负有义务,尽可能地澄清他的道德立场”。(布斯 433、434)

⑧ “Appropriation”一词是利科对德语词“Aneignung”的翻译,原义是使起初“外在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有些学者如中国台湾学者林鸿信将其翻译为“挪用”。

⑨ 在海德格尔看来,“理解”是“在世存在”的结构,它意味着在世界中筹划“最本己的能在”(181),利科将其应用到“文本世界”理论中,在他看来,文本世界尽管是虚构的,但不妨碍它成为此在筹划最大可能性的场所,它以“能够存在”(le pouvoir-être)而非“给定存在”(l'être-donné)的模式针对着此在的生存。具体而言,虚构叙事借

由想象力变更的形式,变形(métamorphoser)了日常现实,打开了“在世存在”的新可能性,以另一种形式“触及现实最深层的本质”(Ricoeur, *Du texte* 114-115),而读者凭借对“文本世界”的“占有”,可以面向文本体验自身多样的可能性。当然针对利科对海氏“在世存在”的发挥,本文持保留意见,鉴于篇幅所限,后期将另外撰文讨论。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Ed. and trans. Roger Cris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Aristotle. *Poetics*. Trans. Chen Zhongme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Aubenque, Pierre. *La Prudence chez Aristo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9.

韦恩·克莱森·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Booth, Wayne Clayson.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Trans. Hua Ming, Hu Xiaosu and Zhou Xi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7.]

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俞冰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Eco, Umberto. *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 Trans. Yu Bingxia.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 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托马斯·曼:《魔山》,钱鸿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Mann, Thomas. *The Magic Mountain*. Trans. Qian Hongjia.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追寻美德:道德理论研究》,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MacIntyre, Alasdair.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Trans. Song Jijie.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Ni, Liangkang. *An Interpretation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Concept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 Company, 1999.]
- 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余碧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 Picoeur, Paul. *Oneself as Another*. Trans. She Bip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
- Ricoeur, Paul. “De la métaphysique à la morale.”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98.4(1993): 455-477.
- . *Du texte à l'action: Essais d'herméneutique II*. Paris: Seuil, 1986.
- .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d. and trans. John Brookshire Thomps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Life in Quest of Narrative.” *On Paul Ricoeur: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Ed. David Wood. London: Routledge, 1991. 20-33.
- . *Soi-même comme un autre*. Paris: Seuil, 1990.
- . *Temps et récit I*. Paris: Seuil, 1983.
- . *Temps et récit II: La configuration du temps dans le récit de fiction*. Paris: Seuil, 1984.
- . *Temps et récit III: Le Temps raconté*. Paris: Seuil, 1985.
- .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Wang, Zisong, et al.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责任编辑:王嘉军)

· 书讯 ·



《批判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作者:海科·菲尔德纳/法比奥·维吉

译者:许娇娜/黄漫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24年2月

本书是一部思考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学术力作。两位作者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和拉康的力比多经济批判,对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原因和后果进行了阐释与分析,对作为西方现代社会无意识矩阵的价值形式加以批判。本书结合马克思和拉康互补的双重视角,阐明资本主义矩阵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模式,不仅解构了资本无限增殖的神话,还彻底批驳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再生产模式的逻辑性、合理性以及表面的一致性,使其构成性的扭曲与历史局限性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来,从而指导人们认识当下危机并采取行动。正如哲学家齐泽克在推荐语中所说:本书“巧妙地将具体的经济分析与对当今世界的哲学、文化的解读结合起来……是一本适合所有想要理解我们所处困境的人的书。简而言之,它适合所有仍有思考欲望的人。”